

胡起望 李廷贵 编

苗族研究论丛



贵州民族出版社

22.917
392
1

苗族研究论丛

胡起望 李廷贵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49808

E026/08

苗族研究论丛

胡起望 编
李廷贵

*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八角岩省委内)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40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412-0008-5/C·1 定价: 3.90 元

前 言

熊 天 贵

根据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的考证，苗族是中国的古代民族之一。苗族的发展，除了具有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共同特点之外，还有自己的许多特殊之点，诸如迁徙频繁，吞吐量大，发展不平衡，反抗性强，以及文化特征古朴典雅、多彩多姿等等。这些“特殊之点”吸引着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去调查，去研究，著述浩繁，见解丰富。其观点，或相同，或相似，或成犄角之势，所以，讨论向来十分热烈。

解放以前，关于苗族问题的讨论，贵州民族学院编有《民国年间苗族历史论文集》，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作为“民族研究参考资料”，已经铅印内部发行。现在中央民族学院苗族史专家胡起望和李廷贵两位同志编选的这本《苗族研究论丛》，是收集解放以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论文，它将给研究苗族的学者带来不少益处，同时也会给广大读者了解苗族的过去和现在，带来许多新的知识。

本书收录的文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族源的，迁徙的，反抗斗争的，发展特点的，也有宗教的，哲学的，民俗的，生产的，还有文学艺术和医学、科技的，等等，算是比较全面的一本集子。而且，每类文章都经过了比较和筛选。可见，《论丛》既照顾了各个方面，同时，也基本上保证了质量。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窥探苗族历史的点点滴滴。

大家知道，经过专家、学者和各地苗族同志的共同努力，

《苗族简史》已经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虽说该书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但终究是我们自己编写的一部苗族简史，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有这样的成绩，所以，苗族人民由衷地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我坚信，再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当苗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都长足地进步之后，苗族历史的鸿篇巨著将会问世，过去所遗留的诸多错谬将会得到克服和订正，某些偏激之词也自然会销声匿迹了。

尤须指出的是，《论丛》中的文章作者，老、中、青研究人员都有，以中、青年居多。他们之中有专业的民族历史研究家，也有业余的民族文化爱好者；有汉族的专家，也有苗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学者。可以说是群英荟萃，各显神通，广集博采，自有建树，都为苗族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砖瓦之功，金玉之言。一支少数民族学者队伍正在形成和壮大，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从作者队伍看，《论丛》所选论文的作者44人，其中苗、侗、仡佬等民族的作者占了一半以上，苗族作者有20人之多，占《论丛》作者中的45%以上。由此可见，在广大的苗族研究者当中，不仅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学者有增加，而且苗族本身的学者队伍也有了很大的增长。由于《论丛》的篇幅所限制，还不可能将更多作者的论文编选入内（本论丛截止于1985年以前发表的论文），但是从已入选的作者来看，我想大致上是可以代表当前苗族研究的状况的。我认为只有各民族专家、学者的亲密协作，充分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推动苗族历史、文化、现状等多方面的研究，有利于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提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共同的繁荣昌盛。

就我所知，国外学者对苗族的研究也很热心。日本的白鸟芳郎、伊藤清司、君岛久子、金丸良子等教授和武内房司、樱井龙彦、谷口裕久等年青讲师，就曾多次到苗族地区调查研究，著书立说，洋洋大观。美国工艺家罗西夫人、博士生路易莎等，也多次到苗

族地区，参加苗族节日，了解民风寨俗，撰文介绍苗族风情、蜡染刺绣，进而开展“忆念考古”，从苗族的古歌和传说中追踪苗族的族源和迁徙。外国学者对苗族事业的热情，使我们深受感动，同时也鞭策我们，必须加强对苗族历史文化和经济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否则，我们又会落后于人。我们应该扔掉什么都落后的包袱，发挥优势，大踏步地行进，至少在“研究自己”方面走到别人支持的前面去。

我们的条件是很优越的，范文澜等老前辈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本书编选时，得到多方人士的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教授为她题写了书名，解放以来的调查资料十分丰富，加上我们培养起来的“自己的队伍”，真可谓资料“浩如烟海”，人才“比比皆是”，的确是万事俱备了。预祝对苗族的研究硕果累累。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987年8月于贵阳

(作者现任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兼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目 录

苗族研究的可喜收获·····	胡起望 李廷贵 (1)
勤劳的苗家 悠久的历史·····	费孝通 (17)
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	马学良 (37)
伏羲女祸与我国南方诸民族·····	侯哲安 (49)
“窜三苗于三危”新释 ·····	马少侨 (60)
“蚩尤”能否引作苗族族源·····	张岳奇 (68)
“康回”与苗族关系管窥·····	杨鹄国 (72)
古代苗族迁徙问题初探·····	顾永昌 (88)
贵州省威宁县苗族古史传说·····	杨汉先 (95)
屈原族别再探·····	龙海清 (112)
试谈长沙马王堆一号二号汉墓的族属问题·····	容观复 (124)
“飞山蛮”初探·····	丁中炎 (135)
苗族古史刍议·····	吴雪传 (143)
苗族原始社会的探讨·····	贺国鉴 (155)
苗族古代社会的氏族制和议榔制·····	杨昌文 雷广正 (169)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苗族农民大起义·····	王慧琴 (179)
乾嘉苗民起义参加人供单简述·····	胡起望 (193)
清咸同年间张秀眉领导的苗族农民大起义 ·····	李玉光 黄吉可 (212)
苗族英雄张秀眉传·····	罗尔纲 (234)
湘西苗族人民辛亥反清起义始末·····	伍新福 (249)

王宪章参加辛亥革命事略·····	杨通儒(265)
苗族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史章——记项崇周领导的 抗法斗争·····	翁家烈(279)
“布将帅”运动纪略·····	吴荣臻(292)
月亮山苗族人民的抗暴斗争·····	梁旺贵(303)
新民主主义时期苗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龙伯亚 张永国(307)
海南苗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的斗争·····	李明天(328)
苗族婚姻史诗《开亲歌》浅谈·····	杨世章(339)
苗族“习惯法”概论·····	李廷贵 酒 素(346)
苗族原始宗教试探·····	陈一石 曾文琼(367)
试论基督教对威宁苗族的影响·····	岑秀文(385)
古代苗族哲学思想再探讨·····	雷安平(402)
苗族“刻道”浅识·····	成文魁(412)
贵州苗族服饰的源流及其形式美·····	岐从文(421)
论湘西苗族医药·····	欧志安(443)
苗族文字改革问题·····	王辅世(467)
苗语声母和声调中的几个问题·····	李永燧 陈克炯 陈其光(473)
从语法看苗语和汉语的密切关系·····	张永祥 曹翠云(499)

苗族研究的可喜收获

胡起望 李廷贵

苗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但又是一个跨界的民族，广泛散布在东南亚的老挝、越南、泰国等地山区，直至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对于这个民族的认真研究，可以说是解放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多属于记录其反抗斗争，调查其风俗民情，很少研究其发展规律与内部的社会结构；即使是苗族自身，也仅限于迁徙传说和民间故事，很少涉及族本和性质，更缺乏分析。

古代，关于苗族的记事有宋人朱熹的《记三苗》，最早提出了当时湖南一带苗族可能是古代三苗遗裔的看法。可惜的是此后如明代胡宗绪的《苗疆纪事》、叶藹的《征苗录》、李 恺 的《外苗近事》、卜大同的《征苗图记》等，都已经失传，难以见到了。清朝，除官修的《钦定平苗述略》、《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外，还有私人编纂的《苗防备览》、《苗疆屯防实录》、《湖南苗防屯政考》、《咸同贵州军事史》、《苗疆闻见录》、《苗变纪事》、《苗俗记》、《红苗纪略》等。近代，跟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一起入侵的是文化渗透，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宗教学人士进入了苗族地区，作了一些调查和记述，计有英人洛克哈特的《关于中国的苗子或土著居民》，克拉克的《中国西部的苗子和其他部落》，日人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法人萨维那的《苗——法词典》和《苗族史》等。近代的国内学者除梁启超提到今之

苗与古三苗的关系之外，没有多少专著。现代，除外国学者如萨维那等继续撰文反映苗族情况外，国内学者调查记述苗族的多了起来，如检曙峦的《贵州苗族杂谭》、张敷荣的《苗族之特点》、《苗族之种类与习俗》、邓平严的《贵州苗族的社会》、觉迷的《苗疆风俗志》、刘锡蕃的《苗荒小记》、王兴瑞的《海南岛之苗人》、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等。由于著名学者蔡元培创办的中央研究院的组织和华北、华东各大学的南迁，出现了一批研究苗族的专家学者，并有专门的研究方向，研究贵州苗族的有吴泽霖、陈国钧、杨汉先、李植人、吴定良、任美镔、梁聚五；研究四川苗族的有胡庆钩、葛维汉；研究云南苗族的有岑家梧、史图博；研究湘西和川南苗族的有闻一多、芮逸夫、凌纯声、石启贵；研究海南岛苗族的有王兴瑞等。迁到贵州的大夏大学，成立“社会研究部”（原名“社会经济调查室”），对贵州的黔东南、黔南等地苗、侗、水等少数民族进行了一些调查工作。有关新中国成立前的苗族研究论文，已由张永国、史继忠、石海波、韩雪峰等同志编辑成《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铅印为内部参考资料。

共和国成立初期，费孝通教授率领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分团，到贵州千山万水访兄弟，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同时调查民族情况，后写成《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其中很多篇是反映苗族情况的。这个时期，梁聚五先生印出了《苗彝民族发展史》和《苗族人民在反清斗争中跃进》，马少侨先生出版了《清代苗民起义》（另一专著《湖南苗族人民革命斗争史》被作为“内部参考”铅印）。费、梁、马三人的著作为苗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起了开拓作用。国家从1956年开始的民族语言普查和从1957年开始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其中包括对苗族情况的大规模调查，为创立新苗文、编纂《苗语简志》和《苗族简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由于“左”的干扰与“文革”时期的破坏，各种研究和

撰著工作停了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研究工作恢复了，先后出版了《苗语简志》、《苗族简史》和各苗族自治地方的《概况》。其中，1985年10月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族简史》，标志着苗族研究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至1985年公开发表的有关研究苗族的论文达225篇之多，其作者队伍之大，涉及问题之广，前所未有。这方面的情况，有的同志曾作过介绍，如伍新福的《苗族史研究述评》（《民族研究动态》1984年第4期），毛宗武的《我国苗瑶语族语言研究概况》（同上，1985年第3期）等。现在综合有关论文资料，将这一时期苗族研究的可喜收获介绍于读者，并求方家同好品评。

1. 对苗族族源的研究有了 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

关于苗族族源问题，解放前就分歧较大，有“三苗说”、“黎”说、“蛮”说、“非三苗说”等，但多是结论性的意见，很少论证。解放后，对苗族族源的研究逐步深入。五十年代，苗族族源上溯到“武陵蛮”、“五溪蛮”、“盘瓠蛮”。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讨论涉及到苗族与“三苗”和伏羲、女娲、“九黎”、“蚩尤”的关系。侯哲安的《三苗考》（《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马少侨的《“窜三苗于三危”新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张岳奇的《试论“三苗”与苗族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王慧琴的《关于苗族的族源问题》（《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等，都大量引用关于“三苗”的历史记载，阐述了三苗的住地、活动，并与后来的苗族作了对比，都认为古之“三苗”与今之苗族有渊源关系，肯定古之“三苗”即今天苗族的先民。马少侨在肯定三苗与苗族关系密切的基础上，对历来注家谓“三

“危”即甘肃敦煌一带的说法，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危”可以训为“高峻”、“险峻”，“山有三峰，故曰三危”，过去记载中的“窜三苗于三危”，意即“逃窜于群山”。因此，苗族的后人，不是远迁西北，而是转入了山区，仍在南方一带。这是比较新颖的“一家之言”。

苗族族源的研究还涉及到伏羲、女娲、祝融、九黎、蚩尤。侯哲安的《伏羲、女娲与我国南方诸民族》（《求索》1983年第4期）、何光岳的《祝融氏和九黎的来源与变迁——论苗族的一支主要先民》（《学术论坛》1984年第1期）、周星的《驩兜与三苗》（《江汉论坛》1983年第12期）等都认为苗族与上述传说人物（部落）有关系，进行了探索。张岳奇的《蚩尤能否引作苗族族源》（《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苗族与蚩尤无关。吴雪涛在《苗族古史探索》（《民族研究》1982年第6期）中，对苗族与三苗、三苗与九黎以及“迁三苗于三危”等，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将“中国西系苗族”、“中国南系苗族”和“贵州的苗族”的历史进行较细致的研究，颇有启发。

对古代人物如屈原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等的研究也涉及到苗族，容观龛认为“汉墓”古尸可能是苗瑶民族（见《试谈马王堆一号二号汉墓的族属问题》，《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介绍不同意见的有云峰的文章（见《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认为屈原是苗族的论文有兰瑜、肖先治的《屈原族别考辨》（《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龙海清、龙文玉的《屈原族别初探》（《学术月刊》1981年第7期）、龙海清的《屈原族别再探》（《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等。持不同意见的有夏剑钦的文章（见《江汉论坛》1982年第5期）。此外，对苗族与楚、三苗与楚的关系也有论文探讨。讨论还涉及到苗族与“盘瓠蛮”的关系、苗族与“巴人”的关系以及海南岛苗族的族源问题。

苗族的语言、服饰、习俗、风情比较复杂，我们应该着眼于

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全局，仔细辨别史料，参照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的资料，透过层层迷雾，审慎地解决苗族的族源问题。

2. 对苗族社会发展的研究开始 触及社会性质及其规律

苗族古代社会经历了漫长的里程，其社会性质问题引人注目。有人认为，早在尧舜时代苗族先人就已形成并用“金”（铜）为兵器，“铜头铁额”，说明开始了奴隶制的萌芽。“窜三苗于三危”后，苗族分成两支——东支（中部和东部方言）和西支（川黔滇方言），被迫迁徙，难以形成稳定的经济制度。有人认为，苗族大约“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完成于唐宋”，“由于各种原因”，“正当苗族形成之际”，“就开始逐步离开原来的地区，向四周扩展”，这是“造成各地苗族经济、语言、文化习俗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张永国《试论苗族的来源和形成》）也有人认为，作为前资本主义的苗族，在宋代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农村公社阶段，为外族封建领主和封建郡县地主所统治，内部逐渐贫富分化而出现阶级对立（贺国鉴《略谈苗族形成的几个问题》）。

对苗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分歧较大甚至意见相反的问题是“苗族是跨越了奴隶社会阶段直接进入封建社会”？1960年的《苗族简史》送审稿认为，“正当苗族社会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和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明显的时候，苗族与其周围汉族的接触也更加频繁起来，汉族封建的生产方式，对苗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封建王朝在苗族地区的控制也进一步加深，这就使苗族在原始社会崩溃之后，有可能不经过奴隶制而迳向封建制过渡”。（铅印本第12页）1985年新出版的《苗族简史》，提出从秦汉到两宋的一千五百年间，“苗族社会的发展，呈现着极大的差异。有的在中原文化的强大的影响下，开始走上了封建的道路，进入

地主制的发展时期，并完全汉化；有的随着他族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有的从农村公社直接向封建地主制转化；但比较偏僻闭塞的地区，仍然停留在农村公社阶段。”可以划分为“江淮等地汉族封建制下的苗族”，“武陵等地领主制的形成和地主制的产生”以及“牂牁以西奴隶制下的苗族”。新版《简史》对苗族的早期历史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索。

诸多论文认为苗族古代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张永国提出苗族是一个受压迫很深、反抗斗争精神很强的民族，是一个发展极为缓慢的民族，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民族。龙伯亚也认为苗族历史的发展是曲折而又极其不平衡的，历史上起义斗争之多，是罕见的。李廷贵则提出了这样的见解：苗族古代受压最深重，迁徙最频繁，吞吐最容易，所以支系复杂，风俗殊异，不仅发展极其不平衡，而且还有倒退现象，各种古风都可以在苗族中间找到。

既然承认苗族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那么，苗族一部分跨越奴隶制而进入封建制是可能的，一部分在他族奴隶主统治下（或称“半奴隶社会”）是可能的，一部分自生了奴隶制后由于被迫迁徙或跨入封建制或倒退回原始农村公社制也是可能的。考古发现也进一步证明了这种“不平衡”与“倒退论”。

3. 对封建王朝的统治方略和苗族的 起义斗争研究的深入

关于历代封建王朝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相继有论文进行研究，如王延武《东晋南朝的治“蛮”机构与“蛮族”活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张雄《略论唐朝治理岭南的政策》（同上，1983年第1期），吴永章《论宋代对南方民族的“羁縻”政策》（同上，1983年第3期），周春元《略论贵州少数

民族地区历代统治政策的演变》(《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等。历史上的一定时期,相当一部分苗族归于当地土司的统治之下,牛儿的《明初贵州“土司制度”的建立》(《贵州日报》1983年5月16日),黄冕堂的《略论清代苗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文史哲》1980年第2期),张永国的《试述黔东南苗族地区土司制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辛雪的《凯里安抚司的设置与裁革》(《黔东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李世喻《试论清朝雍正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及《清朝雍正改土归流善后措施初探》(《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等,都从各个侧面反映了苗族地区土司制度的情况。乾嘉苗民起义失败以后,清王朝在湘西苗族地区“屯田养勇,设卡防苗”,这种屯田制度的建立,一直延续到近代,“革屯运动”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研究清代屯政的论文有伍新福等同志的文章;扬州古籍书店翻印的《苗疆屯防实录》36卷是这方面较完整的资料。

关于历史上苗族人民的起义斗争,早在五十年代就陆续有论文发表,1959年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还专门出版了科普性读物《清代苗民起义》(张福裕,中华书局出版)。粉碎“四人帮”以后,贵州大学历史系编写了《清代贵州各族人民的五次起义》(1978年,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辑铅印了《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论文集》(1979年),《贵州民族研究》等杂志也发表了许多论文,这些论文,不仅有一般叙述起义的爆发、经过和失败,而且有为起义首领写传记的,如罗尔纲的《民族英雄张秀眉传》、贺国鉴的《石柳邓传》、《岩大五传》和《陶新春传》等。有的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到对明清档案材料的利用,从官方档案中找出了起义者的“供单”,为研究苗民起义提供了新的材料,如胡起望等同志的论文。

近年来,关于苗族起义的讨论进一步深入,涉及到更多的起

义斗争，涉及到组织机构和军事思想，涉及到对反动派统治方略的揭露，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关于民国以来苗民反抗斗争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也有论文探讨；伍新福的《湘西“革屯”运动述评》（同上，1983年第4期）。这些论文所记述的反抗斗争说明，苗族人民在受到三座大山压榨的同时，还深受大民族主义的歧视和压迫，他们不堪其苦难深重，往往揭竿而起，和各民族的斗争相呼应，为推翻反动统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也是苗族史上最伟大的一页。

4. 首次开展了关于苗族社会组织的争论

苗族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组织。但过去不大注意研究，1980年以来，李廷贵等对苗族的社会组织进行了讨论，出现了热烈争鸣的局面。其中的论文有：廷贵、酒素的《苗族“鼓社”调查报告》（《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第3期），《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鼓社、议榔、理老》（同上1981年第4期），首次提出了“鼓社”是由同宗的一个村或几个村组成的苗族古代社会的基层单位，是苗族社会进入个体家庭以后的社会组织体制；“议榔”是由一个或几个鼓社进行的立法形式，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所议的条款具有“习惯法”的效力；“理老”是依“习惯法”仲裁的司职人员；这三者是“苗族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三根重要的支柱。”有的同志对“习惯法”的提法持不同意见，韦启光发表了《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等文章，认为苗族没有习惯法，习惯不能称为法，苗族自身没有法。对“鼓社”、“议榔”的性质、作用等问题，杨昌文、雷广正、韦启光、张永国、吴爱平等发表了看法。杨、雷认为，

议榔组织是农村公社的残余，包有农村公社的外壳形式，行阶级社会的职能，它在漫长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年代里，对维持苗族生存、发展内部团结和保持民族特点起了特殊的历史作用。韦文认为鼓社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或母权制进入父权制“完全过渡”以前的时代，而不是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产生私有财产的时候。张、吴则认为，议榔是由秦汉以前部落议事会发展而来，当苗族社会从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向以地缘为纽带的农村公社过渡的时候，议榔作为苗族自身的社会组织而在唐以前逐步形成；按照议榔活动的具体情况看，议榔是农村公社的社会组织，而不是立法形式的组织；当苗族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时，议榔亦随之而发生变化。公开的争鸣是正常的现象。伍新福在《苗族史研究述评》中谈到：“尽管看法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看到和肯定了‘鼓社’与‘议榔’制在苗族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随着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无疑将有助于揭示苗族社会状况和发展规律。”

相关的文章还有潘光华、龙建华、嘉农、吴通才等同志的。有的文章提供了大量的民俗学资料。

5. 对宗教信仰与哲学社会 思想进行了开创性试探

各地苗族都有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解放前的一部分苗族地区的苗民还信奉基督教，因此，苗族地区的宗教信仰情况较为复杂。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杨通儒的《解放前的苗族民间宗教》（载《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综述了各地苗族“鼓社祭”、“吃猪”、“剖果”（祭考）、“阿汪”（解簸箕）、“还泰山”等祭祖仪式以及“还雉愿”、敬“鬼”、祭“龙”、拜大树和岩石等情况。陈一石、曾文琼的《苗